



看到总台马年春晚歌舞创意秀节目《贺花神》,不禁饶有兴味地忆起了去年邂逅的街头真人秀《迎花神》。

那是一个和风煦煦的春日,作为嘉兴土特产回头客,我又优哉游哉地迈上横跨古运河的石拱桥,准备到月河老街寻觅当地手工制作的黑芝麻糖。至桥顶歇息,俯瞰对岸竟突然觉出些非同寻常,桥下聚了不少人,似在围观一拨服装艳丽的特殊游客,不免生出好奇心。奔下桥来,但见那些游客竟是亭亭玉立的一列少女,身着汉服款式衣裙,手持不同花卉,似舞非舞地翩翩而行。“哪里来的?搞什么怪?”我嚷嚷着自语。“不是搞怪,是巡游!”身旁老者一脸的庄重。“巡游?”“对的,花神巡游!”老者对我悄声耳语,“这是十二花神,手里对应的是十二个月的花。咱们这是在迎花神哪!”“为什么要迎花神?”老者并没有对我的愚笨感到绝望,反而耐心地笑着释惑:“今天是世间百花的生日,咱们在过‘花朝节’!待会儿这里还有不少节日活动呢,比如‘闻香识花’‘花间诗谜’‘植物拓印’……”

对“花朝节”一知半解的我,回到家后赶紧补课,从清代擅以诗歌记录岁时节日的蔡云的书籍里,找到了一首介绍百花生日和花神崇拜的诗,即《咏花朝》:“百花生日是良辰,未到花朝一半春。万紫千红披锦绣,尚劳点缀贺花神。”诗尾“贺花神”三字就古为今用地成了今年春晚《贺花神》的节目名了。

资料显示,古时的花朝节是全国性节日,因气候不同,南北方过节日期也不同,一般于农历二月初二、二月十二或二月十五举行。咱们天津杨柳青的花朝节还将民俗节庆与木版年画艺术深度结合,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表达。据传,清代中期花神题材就已进入杨柳青年画,画中以唐宋传奇人物和历史名人对应各月当令花卉。遗憾的是,花神年画原作基本失传,仅部分藏于国外博物馆。好在清道光年间的《花仙上寿图》已为中国美术馆收藏,成为花神年画的历史见证。如今,除杨柳青的花朝节外,天津还拥有丰富多彩的花卉节庆活动,如月季文化节、牡丹文化节、五大道海棠文化节、运河桃花节等。天津不愧是一座乐于爱花、护花、咏花、绘花的城市,也不乏一善于赏花、惜花、养花、育花的人。

天津花卉文化底蕴深厚,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普及率极高的草根性,甚至能普及到我父亲那个忙得顾不上家的消防队“火调员”。儿时,我家小后院就被父



亲辟出一方花圃,高高矮矮地种满了花。低矮的是盆栽肉质,如仙人球、仙人掌、山影,“死不了”,一只只小花盆摆放在花圃最外侧,他叮嘱我:“别给它们乱浇水。一个月不浇也死不了。”我觉得他不过是为顾不上得撂花找借口,便常偷着给其中一盆仙人掌浇水,不久那花竟真的烂了。父亲发现后笑着说:“这回信了吧?”稍高的是紫茉莉,每朵花都开得像一把紫红色的小喇叭,那时我认为它们就是“喇叭花”。后来才知,旁边长得更高些的牵牛花才是大人们认定的喇叭花。我会把这两种花采摘几朵夹在书本中,待它们干了以后,冬天打开书本还能看到花的形状与颜色。我也喜欢将紫茉莉的种子采集后装入玻璃瓶中,常在写完作业后摇一摇小瓶,那一粒粒黑色的小圆球儿,便唱似似的上下翻飞。花圃中最高的是攀援类植物,如扁豆角、赖葡萄。赖葡萄虽被冠以“赖”字,但其实它很漂亮,那橙黄色的果实无论从造型还是颜色来看,都适合绘为静物油画。至于扁豆角,也许因为是自家所种,吃起来便格外地香。直到现在,见菜市场有卖就忍不住买些回来,切成细丝炒炒,重温一下小时候品尝到的味道。

《贺花神》中展示的杏花和桃花,于我而言还真算是“花神”了呢,它们居然能成我在河西走廊兵团生涯中婉转牵上调级机关而坚守农场的“奇怪”原因。在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前五年,我所在的前边基本看不到花。骆驼刺、芨芨草等沙生植物虽性格顽强,却不曾有花的娇嫩与芳香,有的只是大漠戈壁的萧瑟与苍凉。就连兵团人爱唱的歌《送你一束枣花》中那象征坚韧与生命力的沙枣树都未曾见过,因为边湾是一片碱漠,不适宜植物生长。五年后,我从边湾分场调至下河清总场,才一睹沙枣真容,才有了回城后发表的小说《淡淡的馨香》和散文《野树沙枣》。但真正令我爱上下河清的,是那

百花生日是良辰

阎晓明



些夹道而植的杏树与桃树,每到春暖花开时节,行走在宛若多彩长廊的粉色杏花和红色桃花中,就会有一种放声高歌春天到来的冲动,一种生命力骤然焕发的激情,仿佛一切的烦恼、不快、劳累、物质匮乏,都被这花的彩纱轻轻拭去。

后来,师部向团部商调我前往担任宣传干事,团首长征求我意见时,门外正是一派姹紫嫣红景象,难以想象,一抹简单的红色就能像磁石一般将我牢牢吸定在这个桃花盛开的地方,令我深深地留恋与流连。于是,我对团首长说:“您能向上级表示团里需要我,留我在下河清吗?”听闻此事的朋友,大都为我那奇怪而又可笑的理由倍感不可思议,笑称我为“花痴”。不过,那桃花馈赠给我的感怀与力量,却是真实存在过的。后来,不利于植物生长的边湾,经研究论证竟适宜种植一种美丽的绿色花,便由此兴旺发达起来,成为国内闻名的啤酒花生产基地。

花,的确同我们的命运与生活有着某种神秘的因缘与牵连。冥冥中,花神仿佛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参与着我们的日常,作用着我们如梦的浮生。

从甘肃调回天津后,快节奏的工作令我无暇关注花的争奇斗艳,唯有在骑车上下班时,能用余光扫视着绿化带中的月季花向骑行的相反方向“飞驰”,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蹲到路边,去问候与致敬我们的市花。

退休后旅居江南小城,却对四季花卉在意起来,也许是这里花草触目可及、品种繁多而又与北方反差较大才引起我好奇的吧。《贺花神》展示的美容、桂花、山茶、梅花,在这里俯拾即是,而我之前在西北、华北地区生活时见得并不多。所住小区临街的墙隅就有一株枝干挺拔的美容,从围墙上方高高地探出头,将一簇簇形态饱满大方的淡橙色花朵送给墙外更多的人观赏。我总是宁愿绕路到墙外,去仰望她那温婉清雅的仙姿体态。桂花是属于那种眼见不如一闻的奇葩,她的美,不在于

花的绮丽,而是来自你所看不到的她内在的气息。每至金秋,庭院里、街道上,总会弥漫飘逸着一种世间难觅、非常独特的桂花香,最令我陶醉,也最令我惋惜,惋惜她的花期太短,总要满城追着去闻香逐月桂,也许其珍贵就在于此吧。江南小城冬天最最常见的就是山茶和梅花了。无论在河边、在街头、在庭院,她们总会出其不意地闯入人们眼帘。山茶花宽大舒展,枝繁叶茂。梅花小巧玲珑,虽无叶片却能凸显繁花满枝的纯粹超然,卓尔不凡。山茶与梅都有红白两色,白的纯洁似雪,点缀着江南少雪的冬日;红的热烈如火,冷风中能给人们带来视觉上的温暖。

除《贺花神》展示的花卉,江南小城最令我称奇的是瓶刷花与“树上荷花”。瓶刷花看上去是一种常绿灌木或小乔木,红色长方形的花挂满枝头,像极了是一支支可伸进细颈瓶旋转清洗的小瓶刷。仔细端详,这种瓶刷是绝对刷不成瓶子的,因为它是由密密麻麻一层一层微小细穗排列而成的长方形,一碰即散,所以它的学名叫“垂枝红千层”。

同“树上荷花”的奇遇是在一个夏日。那天刚出所住单元楼的楼门,便惊讶地发现对面那棵高大的树上出现了一些以往从未见过的硕大白花,凑近细看愈发讶异,肥硕油绿的叶片间,那花开得竟酷似荷花。同问大门保安,答复这是“广玉兰”,也称“荷花玉兰”。出大门左拐,更神奇景象出现了,一行排列整齐的广玉兰矗立街旁,朵朵“白荷”绽放在墨绿的树冠上,正如同摇曳于芙蓉绿叶上、荷增碧水间。

花的世界就是如此奇妙。花与人的关联更是无比奇妙。一花一世界,一木一生灵。能够为“奇妙花世界”定一个生日,择一众花神的民族,该是一个怎样既崇自然,又诗意浪漫,有着超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民族!

摄影:马成



洁上
丛话

同构使文学成为文化的“肉身”

文化是看不见的内在精神气质,而文学则是让文化显形的“肉身”。研究区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需要看到二者之间深层的同构关系。这意味着,津派文学并非津派文化的“说明书”,而是文化本身在文学语言中的生长与展开。

回望津派文学,可看到这样的传承谱系:从清代水西庄文人群体的宴游畅咏,到近代刘云若笔下的市井烟火,再到冯骥才《俗世奇人》中的奇人奇技,津派文化始终在文学中找寻着呈现形式。刘云若的《小扬州志》之所以被称为“津味十足”,正在于他并非刻意罗列天津风物,而是让老城里的胡同、南市的“三不管”成为人物性格的构成要素所在,在这里,地域不是背景,而是主体。

冯骥才的《神鞭》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小说开篇不惜笔墨地描写天津的皇会,洋洋洒洒、热闹非凡。这段描写不仅为傻二的出场构建了物质空间,其本身更成为津派文化的一个审美镜像:海河码头的喧腾、市井江湖的活力、民间信仰的狂热,都在皇会的锣鼓声中得到具象化的体现。当皇会从民俗活动转化为文学意象,津派文化便完成了从文学的肉身到文化的精神的升华。

地域元素转化为文学的血肉

如果说“同构关系”揭示了文学与文化的内在统一,那么,地域元素又是如何转化为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文学地域性的差异源于方言向普通话的转换,方言与普通话差异越大,其转化过程越能催生鲜活有力的文学作品。这揭示了地域文学创作的深层机制:不是简单的对地域元素的搬运,而是对地域元素的转化与再创造。

津派文学的魅力,正在于对这种地域元素的转化与运用。林希于1990年代后期开始创作津味小说,其创作理念是:一个作家要有自己的腔调。这个“腔调”不是简单的方言写作,而是让天津话的节奏、语气、幽默感渗透进叙事的过程中。在他的笔下,天津卫的市井人物带着几分“味儿”,那是一种在困境中依然能抖出包袱的生命力,正是天津人特有的精神气质在文学中的展现。从狂欢化诗学角度来审视林希小说,可看到其中充满了狂欢化场景、狂欢化人物和狂欢化语言,将天津方言中蕴含的仗义、爽利、幽默的文化性格,转化为读者可感知的审美符号。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学中的转化也值得注意。冯骥才的《俗世奇人》系列塑造了众多身怀绝技的手艺人:泥人张、刷子李、好嘴杨巴,等等,这些人物与传统手工艺相互成就:手工艺品因奇人的匠心成为地方一绝,奇人则因奇技的加持焕发光彩。而且,这些奇人不但注重技艺革新,更会善于宣传营销上的别出心裁,这也折射出近代天津工商文化的浓郁氛围。从手艺人到人物,从技艺到性格,地域文化就这样在文学中获得了血肉丰满的表达。

津派文学的核心叙事场域,始终是天津的市井街巷——劝业场的灯火,老城里的胡同,海河边的码头。冯骥才的《俗世奇人》系列以天津卫的市井街巷为舞台,把天津人“守艺更守义”的文化精神,浓缩在具体的空间之中;林希的作品则将大光明电影院、花旗银行等西洋符号与胡同市井相结合,精准呈现了津派文化开放包容的核心特质。这种市井空间的叙事建构,绝非对城市景观的简单记录,而是把天津人日常的生活空间,转化为承载地域文化元素的文学空间。

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性表达

在全球化与地方性的张力中,津派文学面临着更深层的命题:如何在表达地方的同时,避免被他者化;如何让天津的声音既不被淹没,又不沦为猎奇的样本。地域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从来都是全球文化交流与地方经验互动的结果,中国文学应在世界文学语境中重新确立自己的叙事位置。这指明了津派文学的时代使命:不是构筑封闭的地方堡垒,而是在与世界对话中不断确认自身的独特价值。津派文化叙事的核心在于既立足城市现代性,又不失民间生活的温度。这种平衡正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关键。

“团泊洼文化”为此提供了生动的案例。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创作于1975年,诗人在静海写下了“秋风像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等名句,让“团泊洼”这个名字跳出地域局限,成为镌刻在人们心中的文学符号。近年来,通过对“团泊洼文化”的挖掘与整理,逐渐将其界定为涵盖名人文化、红色文化、农耕文化等复合型文化概念。团泊洼的案例揭示出津派文化表达的当代路径:文学IP的价值在于提供“情感锚点”,当人们在现实中找到文字里的场景,地域文化就从抽象概念变成了可感知、可体验的具体记忆。

近年来,新一代津派作家作出了有益探索:有作者聚焦天津城乡普通人的日常叙事,延续津派文学的平民立场;也有作者将天津历史与多元叙事相结合,打破传统小说的题材局限。与此同时,创意写作视野的引入,让津派文学的表达形式经历着深刻变革。从文本符号到故事世界,从单一媒介到沉浸式体验,《俗世奇人》改编为话剧后久演不衰,诸多津味小说的影视化改编,让津派文化突破了文字局限,被更广泛的受众所熟知。

从这个意义上说,津派文化的文学表达,不是简单地用天津话写天津民俗故事给天津人看,而是让天津的声音成为世界文学多元融合中的一个独特存在。当海河的烟水被记写在纸面上,这就是津派文化最本真的文学表达。这种表达既是地方的,又是世界的;既扎根于天津的市井烟火,又通向人类共通的情感共鸣。在文学与文化的同构中,一座城市的灵魂得以呈现并生生不息。

满庭芳

第五四四期

动静有别 多节点活化

天津意风区的焕新之旅

张娜 常存翰

蝶变新生的城市空间(十三)

天津意风区是意大利本土之外亚洲保存最完整的意大利风貌建筑群。2021年7月,天津入选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明确提出要做好河、海、港、洋楼和小镇五篇文章。在此背景下,意风区开始谋划转型之路。2022年初,我们团队参与到这一片区焕新计划项目中,全过程统筹谋划方案,为这片承载百年记忆的区域注入新的发展动能。

我们与现场游客、在地居民进行对话,通过大量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发现大部分游客对意风区的认知仍停留在“能看意大利建筑的商业街区”的印象,而作为意风区核心的文化灵魂并没有完整地呈现在游客面前,容易造成走马观花式的游览。鉴于此,我们查阅大量文献资料,体系性地挖掘名人故居背后的故事,逐一明确这片气质高雅而又风云变幻的历史街区的文化脉络,最终提出打造两条文化线路:一条为串联意式公建、马可波罗广场、但丁广场的“一官花园文艺复兴之旅”动线,可以让游客观赏最纯粹的意式公建、集中住宅建筑群、街道及广场;另一条为串联袁氏旧居、梁启超故居、曹禹故居的“名人故居主题”静线,逐一呈现意风区的流金岁月。两条线路动静有别,各具特色,为后续业态的引入提供了指导和方向。

以文促旅,以旅兴商。文化线路只是脉络,需要具体功能业态的呈现才能形成体验。我们重新审视意风区核心区的空间发展结构和功能方向,通过文化赋能洋楼载体,融合新文化与创新消费,打造建筑可阅读、文化可体验的新文化消费聚集地。

依托街区式的空间布局,结合文化脉络,我们以自由道、进步道、民主道为界,将意风区核心划为四个主题片区,聚焦时尚活力、品质生活、艺术文化、国际商旅四类体验主题。时尚活力功能区主要是文艺新风尚、创意生活街区,承载一系列年轻群体的餐饮、零售、文化创意生活业态;品质生活功能区主要是意风区的原生空间,彰显天津城市生活品质;艺术文化功能区主要是围绕梁启超故居、曹禹故居、曹禹剧院,发展形成城市特有的艺术文化片区,承载“前店后厂”的创意业态的打造;国际商旅功能区主要是盘活圣心堂旧址、原意大利兵营等标志性节点,承载商业,同时实现商业总部与科技创新空间的联动。

通过融合新文化与创新消费,我们希望为百年历史街区注入鲜活的时代生机,凭借其区位优势与便捷交通,将意风区打造为一个极具核心竞争力的高品质产业承载平台。

历经数载精心雕琢与提质焕新,如今意风区已实现多节点活化,百年历史建筑逐渐褪去沧桑、重焕生机。人们逐渐发现,“洋楼+”模式正持续推动意风区的业态焕新,推动街区从“观光地”向“沉浸式文化体验地”转型——以“洋楼+演出”恢复曹禹剧院沉浸式演出,在马可波罗广场角楼阳台上上演意大利经典歌剧《茶花女》;以“洋楼+科技”推出梁启超纪念馆首家名人旧居实景灯光秀;以“洋楼+艺术”活化圣心堂旧址变身圣心艺术中心;以“洋楼+消费”盘活意大利兵营,打造“东疆之星”意风新经济产业园;以“洋楼+书店”建设新生代年轻人精神文化成长复合空间——钟书阁。

经过几年来的提升打造,意风区内已形成一个文化、艺术、商业多元融合的生态体系,商旅文深度融合发展成效显著,相信在未来这里将成为津城又一张亮眼的文化名片。

(张娜系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城市更新院院长、正高级工程师;常存翰系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工程师)

马背上的中国史(三)

3000余匹汗血宝马

赵威



“马踏飞燕”铜奔马

汉代的马文化直接“开挂”升级,而这一切的起点,是汉武帝对汗血宝马的执念。古代汉唐等外向型王朝,占据河西走廊,打通西域,莫不占有广大草原马产区;而内敛型王朝对这些地带带去控制或控制薄弱,马也成为收缩与扩张的关键因素。汉代与匈奴作战,每次出击,骑兵少则上万,多则10万。为夺取良驹,改良马种,汉武帝不惜对大宛发动战争。

张骞首次出使西域,把大宛、康居等国各种信息带回长安。汉武帝听说大宛有“天马”——汗血宝马,“日行千里,汗出如血”,便派使者携千金及黄金铸成的金马去换。可大宛国王不仅不交换,还杀了使者,抢了财物。汉武帝怒了:“不得到天马,誓不罢休!”公元前104年,他派大将李广利出征大宛,结果汉军水土不服,粮草断绝,打了败仗。两年后,汉武帝派李广利率率六万大军再征,这一次连牛、马、骆驼都带上了,最终大宛贵族杀了国王投降,献出了

3000余匹汗血宝马。虽然路上损耗严重,只剩1000多匹,但这些宝马彻底改变了汉朝军队的马种。汉武帝喜出望外,不无得意地说:“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

甘肃武威出土的“马踏飞燕”铜奔马,就是汉代的巅峰代言:高34.5厘米,长45厘米,三足腾空,一足轻轻踩在一只飞燕上,飞燕的翅膀都被震得向后张开。马的肌肉线条紧绷,胸部肌肉隆起,臀部饱满,连马鬃都因为高速奔跑而向后飘起,把风驰电掣四个字刻成了永恒瞬间。有学者说,这匹马的造型融合了汗血宝马的特征——体型高大,四肢修长,和之前的中原马截然不同。正是有了这样的好马,卫青、霍去病才能率军深入漠北,封狼居胥,把匈奴打得“漠南无王庭”。

新疆出土的汉代木简,更是藏着马的日常:“官马日行百里,疾行百二十里”“马病,赐药钱三千”,连马的“考勤”和“医疗保障”都有记录。那时候还流传着“伯乐相马”的故事,虽然伯乐是春秋时期的人,但汉代人把他当成“相马神”。传说伯乐能从马的骨骼、毛色、眼神中看出它的能力,他写的《相马经》更是被奉为经典。有一次,伯乐路过虞坂,看到一匹拉盐车的千里马,这匹马累得倒地不起,伯乐一看到它就哭了,解开自己的衣服盖在马上,马居然仰天长啸,声音响彻云霄。这个故事在汉代广为流传,连画像石上都有相关图案,可见汉代人对于好马的珍视。

来到陕西省蒲城县义龙村时,已是晚秋时节,柿子树上硕果累累。从古老的城墙门洞往里走不远,一座古色古香的老房子映入眼帘,门楣上悬挂着“大夫第”匾额,左右房檐下挂着“文魁”“进士”的牌匾。门口赫然矗立着一块刻有“抗日民族英雄包森故居”的石碑。

著名抗日英雄、冀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包森,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当年他在冀东战场上威名赫赫,被称为“中国的夏伯阳”。1990年,天津电影制片厂参与拍摄的以包森事迹为题材的电影《剑吼长城东》轰动一时,其主题歌高度概括了包森的一生:“千里击强虏,剑吼长城东。壮岁国难死,悲歌燕赵风。”

包森故居的主卧室陈列了他的父亲赵连登和母亲万彩娃的遗像。1911年7月,包森就出生在这个房间。父母给他起名叫赵森森,又名赵寒(后改名包森)。家里兄妹六人,包森排行老三。因父母去世较早,比包森大11岁的大哥赵宝麟和妻子承担起抚育包森的责任。大哥大嫂出资供包森到县里学堂学习。靠着天资聪颖和刻苦努力,包森在学生时代就崭露头角。受进步思想影响,他从17岁开始投身革命,多次入狱,却坚贞不屈。1937年3月,党组织派他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包森故里行

金学钧



七七事变后,他从延安随八路军115师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辗转作战。1938年6月,包森随八路军第200师挺进冀东,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他率40多人在河北兴隆一带开辟了抗日游击区。1939年4月下旬,包森指挥部下活捉日本宪兵大佐赤本,一时震动日本朝野;同年秋,包森被任命为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1940年2月,包森率部到达盘山,带领战友们开辟新根据地,同年秋,八路军冀东军分区第十三团正式成立,包森兼任团长。他智勇双全,屡创奇功,指挥作战先后取得了白草洼战斗、果坨战斗等

胜利,令敌人闻风丧胆。1942年2月17日,包森率部在遵化野狐山与日、伪军作战时壮烈牺牲,年仅31岁。

“家国担当”是包森用生命写就的家训,在这个大家庭里传承至今。包森烈士的侄孙赵珂,指着一张1963年爷爷赵宝麟在盘山烈士陵园包森墓前照的一张照片感慨不已。自1957年盘山烈士陵园建成后,家里总会派人到盘山脚下的包森墓前祭扫。如今,爷爷赵宝麟、父亲赵维岳都不在了,赵珂和姐姐赵琦继承这一传统,每年清明节都要到盘山烈士陵园给爷爷包森扫墓。赵珂说,父亲赵维岳7岁那年与包森有过一面之缘。那年,包森行军路过故乡,回家住了一晚。临走时,他抱起赵维岳,击了一下手掌说:“赶快长大,把咱爸(陕西方言:坏人)赶出中国!”受包森的影响,赵珂的父亲和他先后参军报效祖国。

蒲城县人民也没有忘记这位抗日英烈,重新修复了包森故居,修建了包森衣冠冢,并设立了包森英雄事迹展。令人感动的是,蒲城县延安精神研究会将包森故里苹果品种“秦冠”“瑞雪”接穗各13条,赠给远道而来的蓟州同志,以纪念包森生前所率领的八路军十三团在盘山立下的赫赫战功。这些接穗将嫁接到盘山脚下的苹果树上,培育全新的品种“包森红”。